



教育剩余论

— 关于教育系统的生存危机与自我确证

● 曲正伟 // 著

JIAOYU LIYILUN

GUANYU JIAOYU XITONG DE
SHENGCRN WEIJI
YU ZIWO QUEZHENG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教育利益论

——关于教育系统的生存 危机与自我确证

曲正伟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教育利益论：关于教育系统的生存危机与自我确证/
曲正伟著.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 - 7 - 5602 - 6737 - 1

I. ①教… II. ①曲… III. ①教育事业—研究—中国
IV. ①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1014 号

责任编辑：王 蕾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刘晓军 责任印制：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邮政编码：130117）

电话：0431—85687213

传真：0431—85691969

网址：<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sdc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170 mm×227 mm 印张：14.25 字数：236 千

定价：28.00 元

摘要

基于“回到教育系统本身”的认识，本文以教育系统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起始，试图对当前我国教育领域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归因，并从而确立教育系统自身独特的功能价值和主体地位。具体面向的问题域是：教育系统是否存在自身的利益需求，这些利益需求是什么？当前我国教育系统的这些利益需求得到满足的现实状态如何？是谁造成了我国教育系统的“饥饿”状态，又将由谁承担起教育利益供给的责任？

教育系统从社会大系统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领域，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和操作规则。这些规律、规则以及保障这些规律规则的教育实体结构就是教育系统存在的本质规定性，也构成了教育系统自身的利益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系统的功能实现是相对封闭的。但同时教育系统不可能自给自足，它需要和其他社会子系统发生相互的联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得到其自身所需要的物质和能力，以维持教育系统的功能运作。但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双向关系逐步成为一种单向服务的关系，只强调教育系统的功能发挥，而不注重教育系统自身利益的满足与实现。教育领域成为社会的“公地”，成为社会规律的“实验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教育系统也形成了利他化的制度倾向，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资格，不能在系统之间进行必要的关乎生存的利益互换，而只能一味的单向功能输出和利益输出。

本文认为，在社会系统理论的观点下，教育系统自社会大系统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具有功能自律性的生命体。它有自身的功能、规律和运作规则，有自我参照和自我生产的价值认可机制。正是由于教育系统存在着功能与实体上的需求，教育系统才成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利益实体，我们能够满足教育系统生存和发展为基础的各方面的资源称为教育利益。基于这样的观点去分析我国教育系统现实运作的具体情况，我们会发现，我国教育系统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内在价值分裂和外在功能缺失两方面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体现在对于教育系统实体的危害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教育人”的具体行为逻辑中。

本文强调，我国教育系统正处在一种生存性的危机之中，是在我们谈及发展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树立全面的教育系统观念，建立

2 教育利益论

一种利益互换的教育系统发展模式，不仅要看到教育系统的功能输出，同样也应当包括教育系统外部环境对于教育系统本身的物质、能力与信息的输入。因此，政府首先要区分教育系统的“生存”和“发展”这两类问题，并采取不同的秩序工具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和解决。这才是系统观点下的问题求解，也是本文的一个论证基础和框架。

关键词：教育系统；利益；生存；优先发展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back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tself”, educational system is the research aim of this paper, which to find out the reason for the problems in our educational fields and thus establish the education system own unique function value and main body status.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faces the question territory is that: Whether does the education system have own benefit demand, what are these benefit demands? How about the condition does these benefit demands of our country educational system to be satisfied? Who created our country educational system to be “hungr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s independent field of function, separates from the social system, which has own rule and the operating instruction. These rules and instruction, also with the education entity structure are the essence to its existence, also constitute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wn benefit demand. But now these benefit demands are not be satisfied by the others, educational system has not its own consciousness and the qualifications, which leads to the institutional altruism.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s independent field of function, separates from the social system, which has own rule and the operating instruction, which cannot be denied by the other. And the education entity is “the self—description” of educational system, which has the demands of the self— maintenance and the boundary-maintenance. So we called the education benefits is the resources and the conditions satisfie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survival. Based the above, we then analyze the special details of our country educational system. The result discovered that, our country educational system has the intrinsic value fission and the external function flaw, which process “the survival crisis” in the practice.

So, this also make our country education system has “the survival

2 教育利益论

question”, thus needs to establish one kind of benefits exchange system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government firstly must differentiate two kinds of question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he survival” and “the development” in our educational system, and adopt the different order tool to explain and solve the actual problems.

Key words: Educational system; Benefits; Survival; Priority development

目 录

摘要	1
引言：“改革反思”话语中的教育问题求解	1
第一章 系统观点下的教育利益证明	9
一、系统理论的发展述评	9
(一)系统与系统理论	9
(二)系统与系统方法	15
(三)对系统理论推进的小结	20
二、系统理论观点下的教育“系统”	21
(一)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的次功能系统	22
(二)“二元规则”运作下的教育系统	23
(三)教育系统在我国社会中的价位与判断	26
三、作为教育系统“自我描述”的教育实体	31
(一)教育实体与自我维持	32
(二)教育实体与系统边界	33
四、关于教育利益的提出与证实	36
(一)利益是主体需要的客体化	36
(二)教育利益是教育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客体性资源	38
(三)教育利益的分类	41
第二章 我国教育系统的生存危机与利益互换机制	44
一、我国教育系统的生存危机	44
(一)教育系统中的制度与制度化实现	44
(二)我国教育系统的内在价值分裂	46

(三)我国教育系统的外在功能缺失	49
二、教育系统的“生存”前提与利益互换	52
(一)生存的前置性:我国教育系统问题研究的基础	52
(二)教育利益与“集体行动”	56
第三章 我国教育系统制度性利他主义的社会后果	67
一、我国教育系统的制度性利他主义	67
(一)利他:从生物学到经济学的研究	67
(二)我国教育系统利他主义的制度化特征	71
二、我国教育系统实体的“崩溃”与社会后果	76
(一)走向失衡的教育结构	76
(二)作为“政绩”的教育规模与速度	85
(三)被建构的教育“质量”	90
(四)“原始积累”中的秩序演进:一个小结	96
三、面向问题:两种改革的尝试	100
(一)伊万·伊利奇的“非学校化社会”	100
(二)蔡元培的“教育独立论”	103
(三)“制度之内”与“制度之外”	105
第四章 “教育人”的制度生存逻辑	107
一、作为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	107
(一)作为制度化利益的“教师身份”	108
(二)教师法律身份与社会身份的“重叠认同”	110
(三)“重叠认同”中的价值选择	112
二、校长的制度化生存逻辑	115
(一)校长职业生存的制度背景	115
(二)校长生存的制度环境重建	119
三、制度关怀与学生的生命成长	121

第五章 我国教育系统的生存秩序与提供机制	124
一、教育“饥饿”从何而来	124
(一)“贫穷—饥饿”成为教育系统的生存意识	125
(二)对教育系统中“贫穷—饥饿”文化的归因	136
二、教育秩序何以可能	145
(一)教育秩序形成的三种路径	145
(二)对教育秩序的混合提供机制	151
三、三十年教育政策取向的演进考察	161
(一)基于效率基础上的合法性秩序	162
(二)基于公平基础上的正义性秩序	167
(三)基于质量基础上的合规律性秩序	172
第六章 教育优先与教育利益实现中的政府责任	178
一、教育优先发展的属性逻辑转换	178
(一)教育是一个产业	179
(二)教育是一种“最基本的建设”	180
(三)教育是一项社会事业	182
二、优先保障:务实的教育优先观	184
(一)政府要学会做教育的判断	185
(二)政府要保障教育经费投入	186
(三)政府要保证教育实体的完整与功能	190
三、优先发展:积极的教育优先观	192
(一)法治优先:设定各个教育主体的行动规则	192
(二)财政优先:强调教育财政的充分性与公平性	195
(三)“人”的优先:面向“人”的教育发展	199
(四)和谐优先:正确认识和解决教育系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2
结语	205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15

引言：“改革反思”话语中的教育问题求解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三十年。客观研究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取得的成绩，找出问题和不足，是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进一步继续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将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论述的起点，不仅是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社会转型时期的发端，更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价值体系的合法性，开启了并正在建构着一种全新的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模式和思想认知习惯，以及建基于此的全新的价值体系。在这场由改革开放所启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深入的变化，就像学者归纳的那样，“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单一的所有制机构到多元所有制结构、由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到逐渐增多的社会自治、由国家社会个人一体向三者分化相互独立。”^① 这些转变影响深远，在当今的政策中仍还能找到当时的改革“痕迹”，它们已经内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并成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反映。

认识重大历史变革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时代的理解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上对于改革的争议和讨论也越来越多。社会改革如此，教育改革同样存在不同的说法和评判标准。比如，莱文和洛克希德（Levin and Lockheed）就认为，一个有效率的教育制度至少要反映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增加参与（growing participation），其中包括入学率、完成率和学业成就；第二，更有效（more effectiveness），其中包括更少的辍学率和留级率以及积极的学习结果；第三，增加资源（increasing resources），其中包括生均成本、每年经常性公共教育支出、合格的教资、设施、教材等等。随后他们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发展教育的处方，即“基本投入”（basic inputs）、“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

^① 高兆明，等. 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秩序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45.

ditions) 和政府与社会“采取行动的意愿”(will to act)。^①按照他们的标准，从基本投入和便利条件上看，虽然中国在教育资源分布上存在区域差异，城市和农村学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学校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对于贫苦地区的最低办学标准，实现了“一无两有”(即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实现了校舍、桌凳、大门、围墙、操场、厕所“六配套”；从行动意愿上说，中国政府逐渐从“人民教育人民办”走向“人民教育政府办”，强化了政府在教育中的公共责任，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的颁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都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社会对于教育事业的支持在中国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从现实层面上的数据分析，从1981年至1991年的11年间，我国多渠道筹措用于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经费达1071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为357亿元，社会集资、捐资等各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700多亿元。可见，在教育发展的某些具体阶段，社会对于教育的贡献程度比政府还要大。还有学者用“3C”的标准框架来分析教育政策，具体表述为一致性(consistency)、连通性(connectedness)和文化适应性(culture fit)。一致性是指一项政策内部是否能够保持在目标方向上的一致性；连通性是指各个政策之间是否能够保持沟通和相互协调；而文化适应性则是指政策的制定、实施是否和传统文化以及具体的教育实际相适应。^②这种观点分析下的中国教育政策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政策上缺乏一致性；连通性和文化适应性的现象确实存在，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是很明显，仍可以作为解释中国发展成就(story of success)的一个框架。^③还有学者从权变理论出发，对中国教育政策发展中的目标和路径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他们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最好的政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政策实施的难度在于其改革目标的多样性以及教育改革的不可预测性，等等。中国实践中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路径，正是不拘泥于一种发展模式，是一种权变思维的体现。正是这种“没有策略的策

① Levin H M, Lockheed, M E. Effective schoo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Falmer Press, 1993: 1—19.

② Dowson C, Bodycott P, Walker A, Coniam, D. Education reform in Hong Kong: Issues of consistency, connectedness and culture.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2000, 8 (24). Retrieved November 18, 2001 from <http://epaa.asu.edu/epaa/v8n24.html>.

③ Wang C, Zhou Q. Basic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Untangling the story of success.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2002, 10 (15). Retrieved [date] from <http://epaa.asu.edu/epaa/v10n15.html/>.

略”（the strategy of not having a strategy）使中国政府可以适时地调整政策，并能为下一步改革（re-reform）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反思改革的整体话语背景之中。有意思的是，2005年这个被温家宝总理定位为“改革年”的年头，结果却变成人们反思中国改革成败的一年，“质疑改革的声浪此起彼伏”。尤其是在国务院研究室提出“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之后，这种“不成功”的标签随即被套在了我国电力体制、邮政体制等社会改革之上。“改革”因此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一些要以改革名义去推动的事情，越来越失去公众层面的合法性基础与话语力量。公众纷纷要求重组、反思甚至“终止中国的整体改革”。反观教育领域，我们很“庆幸”，因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①，其主要依据主要体现在：我国95%的人享受了“两基”教育（基本扫除文盲，基本享受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21%以上。

这种感性的判断可能会使我们盲目地狂欢一阵，但情绪稳定之后的冷静思考也是必要的。我们的教育改革真的成功吗？得出这种“成功”的标准是否恰当？如果真的成功，又如何解释“教育支出是当前农民家庭的主要负担”、“因贫而不能受教”、“因教致贫”以及“贫富差距代际移动”等诸多不和谐现象？如果不成功，那么以后的工作又应朝哪个方向发展？是不是真的需要对教育改革进行重组、反思甚至否定？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设定教育改革的原则、方向或者标准，还需要“回到改革的本身”，因为“不管变革是人们所追求的还是抵制的，不管变革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有计划出现的，不管人们是站在改革者或操纵者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个人的或机构的立场上看待改革，他们对改革的反应具有矛盾特征。”^② 所以，探究改革就必须关注在时间基础上的结构维度。这里的结构不仅仅是一种架构，同样也是一种关系，要在系统、组织以及人的心灵系统的互动关系中，在时间的流动中去评判“成败”和检讨“问题”。

任何一次改革都是政府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重新组合的过程。教育改革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或社会背景中进行，即社会环境为教育改革活动

^① 2005年12月22日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对教育改革以及近期教育热点问题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② [加]迈克尔·富兰.教育变革新意义[M].赵中建,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31.

的主体提供全部的背景。对于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公共权力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支配力量，更加是一种改革的外部环境。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社会大系统之一的教育，要时常“遭遇”、切身处在这一场域之中，并成为我们探讨教育问题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事业如何在社会大体系中重新定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教育事业很重要，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共识。如果不是这样，政府就不会明确将“教育要优先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自身合法性的证明；如果不是这样，贫困家庭就不会背负更重的经济压力送子女上学，富裕家庭也不会为子女而费心选择学校和专业。这些都成为教育事业对于国家、对于个体重要性的现实依据。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概念提出以后，“教育因何重要”就具有了理论上的基础和解释力，形成了“教育——人——发展”的思考逻辑，而在这一逻辑中，教育事业处在最基础和最核心的地位，同时也内在地将教育发展涵盖在社会发展之中。

但在社会发展的转型过程中，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出现了诸多“社会性”问题。教育作为一种利益的存在，作为“亿万家庭的最大希望和最大利益”，在现实中越来越向某个人积聚、向某个团体和阶层积聚、向某个地区积聚，甚至在教育系统内部向某一类别积聚、向某一阶段积聚，这样的教育无法成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这种教育发展路径也不会产生利益共享的现实结果。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产生诸多的疑问：应如何理解教育的公益性质？教育究竟是谁的教育？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向富裕阶层流动？为什么教育对于不同群体的作用有这么大的差距？谁又是教育改革的最终受益者？这些都是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也成为民众指责教育和要求进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一方面把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教育改革去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既符合逻辑也不符合逻辑。因为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创造公共利益，实现公共价值，这和社会改革在指向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改革是促进社会合法性、优化社会合法性的动力机制，同样，社会问题的显性化也是一种对于教育改革的反思机制，从中可以看出教育改革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是在符合逻辑之余，我们也会发现仅仅依靠教育改革并不能为社会做那么多的事情，去充当社会的“平衡器”和“稳压器”。社会发展有社会发展的社会规律，教育发展同样也有自身的规律，用教育的规律企图代替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行不通的。当然在现实的条件下，更多的是社会将问题解决的“麻烦”通通

推卸给了教育，而且社会中的个体也需要一个对公正性抱怨进行发泄的途径。

因此，教育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太多的模糊区域，问题模糊、责任也模糊。我们越来越搞不清问题的归属，同样对该承担的责任也互相推诿。“社会”认为教育的问题最大，同样“教育”也认为社会的问题更大。就像有很多学者得出的结论那样：政府是当前教育利益积聚的首要责任者，正是由于政府的权力失控或者在政策取向上缺乏公共维度才使得当前的教育领域存在诸多的差距，才会对教育有这么多的不满意。因此，要从利益的积聚实现对利益的共享就必须对政府进行重塑，对公共权力进行规范，对公共政策要作出合法、合规律、合道德的定位。但笔者认为，这种外部的归因方式虽非常重要，但又十分片面，它只是对当前教育问题的解决作了一个简单化的结论。对任何问题的归因都不可能是一个单因素的结构，教育问题更是如此，不仅有教育外部权力的介入因素，也有教育内部的自身原因，正如前面所说的，只有在“系统—组织—个体”的维度上去考察教育问题的成因，分析它们各自对于教育问题所占的影响比例，才是我们分析问题的真正逻辑。如果仅仅简单地把教育问题归结于政府，即使说出了问题的要害，也对政府不公平，因为没有说出政府究竟做了什么，这种政府行为又使教育系统发生了什么。就像我们经常用“差距”、“失衡”这样的描述性分析，却无法对教育问题作以正确而理性的判断，这些问题对于教育系统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意味着什么，都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应当更清楚地知道当前我国的教育问题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是生存，还是发展，因为面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性质，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求证也不尽相同。否则，不仅会使真正的教育问题被掩盖，也是对当前教育改革问题的一种认定错误。

既然教育问题是一个内外因素结合的产物，我们在关注教育系统外部的同时，更应该对教育系统自身作深入的研究。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有它自身的独特功能，有它遵循的发展规律和运作规则。同时教育系统也不是封闭的，它需要和其他社会子系统发生相互的联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得到其自身所需要的物质和能力，以维持教育系统的功能运作。因此，教育系统同样也面临着生存问题，而“差距”、“失衡”、“无序”正是对教育系统生存性危机的一种描述。而政府没有考虑教育系统的自身生存需要，更多的是考虑“可以从教育中获取点什么”，没有“可以为教育做点什么”这样的公共责任的承担意识。因此，教育系统始终逃不脱作为工具的地位，逐渐成为社会的“公地”：以前是政治的工具，在市场经济的

大潮中又不断成为经济的工具，唯独缺少的是对于教育系统自身价值和存在合理性的证明。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教育事业“理论上很重要，实践中不重视”的深层原因，这实质上是我国教育系统的一种生存性危机，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资格，不能在系统之间进行必要的关乎生存的利益互换，而只能一味地单向功能输出和利益输出。但在这种条件下的教育功能输出可能已经不再是教育的功能，而是教育系统为迎合资源掌握者的取向而产生的一种替代性功能，它既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也不是资源掌握者所预想的教育功能。

因此，我们应当树立全面的教育系统观念，不仅要看到教育系统的功能输出，同样也应当看到包括教育系统外部环境对于教育系统本身的物质、能力与信息的输入。这才是对于教育改革的全面理解，也是本书的一个论证基础和框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我们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审视教育工作。因此，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们对教育的看法，对以往教育的一些概念与范畴都应当重新界定和分析，因为从“和谐”的角度出发，教育系统的存在不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系统的双向存在，突出教育系统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教育系统与社会之间的利益互换过程。

本研究是对教育系统的研究，共分为六章，根据各个章节内容，试图主要分析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章“系统观点下的教育利益证明”。这一章主要是对教育系统的本体问题的分析，它是全文的理论基础。研究教育系统的生存问题，就必须对教育的系统性质有清晰的理解，要明了教育系统是什么，又有哪些系统利益需要。在社会系统理论的观点下，教育系统自社会大系统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具有功能自律性的生命体。它有自身的功能、规律和运作规则，有自我参照和自我生产的价值认可机制，对于外部的社会，只有教育系统将其内化成内部的环境时才可能对其作出回应，否则，就只能是外部的，因为它有自己的“涵括/排除”的二元规则来支撑系统的运作，不能由外部因素来改变这种规则，外部因素的硬性介入只能导致教育系统的自身消灭。正是由于教育系统的这种功能的独特价值才使得社会、公众给予教育系统更多的价值认定和期待。同时，教育实体是教育系统的“自我描述”，是教育系统的功能具体承载者，它也存在着教育实体与自我维持、教育实体与组织边界的界定问题。正是由于教育系统存在着功能与实体上的需求，教育系统才成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利益实体，我们能够满足教育系统生存和发展为基础的各

方面的资源称为教育利益。

第二章“我国教育系统的生存危机与利益互换机制”。这一章是对我国教育系统在现实中运作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教育系统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内在价值分裂和外在功能缺失两方面的“生存危机”，这也凸现出我国教育系统中“生存问题”的前置性，因而需要建立一种利益互换的教育系统发展模式，以改变“单向服务”、“单向利益输出”的现实。这种利益互换机制所以成立，因为教育系统的“产品”——教育利益是一种“集体行动”的产物，是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个人形成的价值共识，也就是说，教育利益是国家的利益也是个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对教育系统进行利益互换以维持教育系统的生存，进而实现教育利益对于国家和个人的享用。

第三章“我国教育系统制度性利他主义的社会后果”。这一章是对我国教育系统生存危机的原因进行分析。基本结论是，目前我国教育系统出现的“单向服务”逻辑是超出生物学和经济学利他主义之上的制度化利他形式，更有政治分配的色彩，这也造成了教育系统实体的崩溃，比如走向失衡的教育结构、作为政绩的教育速度与规模、被建构的教育质量概念，等等。但是本书认为，对于教育系统在结构、规模与速度以及质量上的无序，在价值上存在合理性，因为这是必要的“原始积累”过程，它使教育系统能够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产生自身的生存逻辑。但这并不是要我们忽视问题的严重性，历史上的两种改革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素材。

第四章“‘教育人’的制度生存逻辑”。这一章主要选取“教育人”作为分析的对象，试图研究在教育系统制度化利他主义下，“教育人”是如何实现生存的。这是在“系统—组织一人”的逻辑下进行的，主要涉及对教师身份的多重认同问题，对校长行为选择的制度化生存问题，以及学生生命成长的制度关怀问题。所以选择这三个主体，其原因在于三者是构成教育发展的微观主体结构，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生存状况的具体反映。

第五章“我国教育系统的生存秩序与提供机制”。这一章主要探讨了在教育系统中，饥饿从何而来、秩序何以可能，又是何种优先性的问题。经过分析，在我国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一种“饥饿—贫困”文化，这种文化有其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历史上的“穷国办大教育”、“人民教育人民办”造成了这种文化，而现实中多种教育秩序工具在选择过程中的价值混乱，也强化和加深了这种文化在教育系统中的沉淀和累积。这也突出了政府在教育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三十年教育政策演进过程的梳理就是例证。